

河南南阳汉墓 出土陶井明器的区域特征

□ 武 玮

水井的发明与人类的定居生活和农耕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周书》曾提到古有“黄帝穿井”、“尧民凿井而饮”，说明凿井历史的久远。目前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下游地区人类文化遗存中已开凿和使用水井^[1]。至汉代水井设施更被广泛地使用，考古发现的汉代居住、农业及手工业遗址中出有大量的水井遗迹，如河南安阳内黄三杨庄庭院建筑遗址中家庭生活用井^[2]、河南南阳北关瓦房庄冶铁遗址中用于冶铁的水井群^[3]等。此外两汉墓葬中也多随葬陶井模型明器，是模仿现实中的水井设施，将之形制尺寸微缩做成模型埋入墓中供死者享用。

河南南阳地区为豫、鄂、陕三省交汇之地。这一地区出土汉墓较多，墓中随葬陶井出现较早，并且非常普遍，与河南其他地区出土陶井明器比较，南阳汉墓的陶井具有较强的地域特点。目前学者对南阳汉代陶井的研究仅停留到型式划分与制作分析方面^[4]，但对陶井的形制演变、区域特征及成因则很少提及。故本文将侧重分析南阳陶井模型的区域特征及成因，以期求教于方家指正。

一、南阳汉墓出土 陶井模型明器型式及分期

目前出土陶井模型明器的汉墓集中在河南南阳市城区及市郊、唐河、新野、镇平、方城、桐柏、淅川等地。主要有南阳市环卫处汉墓 M1^[5]、南阳第二胶片厂汉墓 M6^[6]、南阳市 508 厂汉墓^[7]、南阳石刻汉墓^[8]、南阳市陈棚村汉墓 M68^[9]、南阳辛店乡熊营画像石墓^[10]、南阳市一中新校址汉墓 M36^[11]、南阳市东苑小区汉墓^[12]、南阳市嘉丰汽修厂汉墓^[13]、南阳市教师新村 M10^[14]、南阳中建七局机械厂汉画像石墓^[15]、南阳蒲山汉墓^[16]、南阳市拆迁办 M3^[17]、南阳方城县城关镇汉画像石墓^[18]、南阳方城平高台遗址汉墓^[19]、南阳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20]、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21]、唐河县石灰窑村画像石墓^[22]、唐河县针织厂汉画像石墓 M2^[23]、唐河县湖阳镇汉画像石墓^[24]、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25]、邓州市梁寨汉画像石墓^[26]、南阳淅川程凹西汉墓^[27]、淅川县下寺汉画像砖墓^[28]等。

根据河南南阳汉墓出土陶井模型的形制不

d.侯晓毅、严志斌《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

[10] 陈雪香《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玉器探析》，《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

[11][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99年。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

[14] 孙华《试论三星堆文化》，《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

（作者工作单位：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

同,我们将之分为二型(见表)。

A型 无陶质井架。依口沿、肩、腹部变化分为4亚型。

Aa 敛口,无颈、肩,圆筒腹,平面为圆形或椭圆形,口径小于底径,器形矮胖。依口沿、腹部变化分为2式。

式 口沿为方形或圆形,圆口,斜直腹。标本河南南阳市508厂汉墓M1:7^[29]。

式 宽平沿,斜直腹,底部外侈,器形较式更加矮粗。标本河南南阳新野樊集M13:3^[30]。

Ab 敛口,弧腹,平面为圆形或椭圆形,口径小于底径。依口沿、腹部变化分为2式。

式 弧腹,近底微鼓。标本河南南阳东苑小区汉墓M31:20,灰陶,腹部近底部微鼓。口沿及器身模印有几何图案^[31]。

式 弧腹,近底微内收。标本河南南阳镇平程庄M132:13,灰陶,宽平折沿,方唇,斜弧腹,近底处内折,平底。井内置一汲水罐^[32]。

Ac型 敞口,无颈、肩,圆筒腹,口径近于或大于底径。标本河南南阳新野樊集M25:8^[33]。

Ad 敞口,束颈、折腹,圆筒形腹。依口沿、腹部变化分为6式。

式 束颈,器形矮胖。标本河南南阳唐河汉画像石墓出土井,红褐釉陶,宽平沿,口微敞,平底。井内置一汲水罐^[34]。

式 器形较上式高。标本河南南阳新野樊集M34:5^[35]。

式 器型增高,颈变短,折腹处将器身分为井栏、井圈上下二节,腹部以下向内斜收。标本河南南阳唐河冯君孺人画像石墓出土^[36]。

B型 有陶质井架。标本河南南阳方城党庄汉画像石墓出土陶井,井身方形,梯形井架,井架上有井亭^[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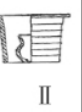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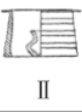




根据南阳墓葬出土陶井的型式演变,并结合墓葬共出的其他陶器组合,铜镜和铜钱等具有断代的器物以及墓葬形制变化,我们将南阳汉墓出土陶井分为五期(见表)。自西汉中期始,南阳中小型墓葬普遍随葬陶井,多为每墓出土1件。陶井井口圆形,圆筒腹,无陶质井架,依照井腹形制不同,分有Aa、Ab、Ac、Ad型,有底或无底。井内多置汲水罐。Aa、Ac、Ad型井身以素面为主,少量上饰弦纹;Ab型井多在井身及井沿上模印有规则的几何纹、云纹、圆圈纹饰等。东汉时期墓葬中开始出现有陶质井架的B型井,但数量较少。井身少有装饰,多饰弦纹。此外东汉时期墓葬中随葬陶井较之西汉时期已不是很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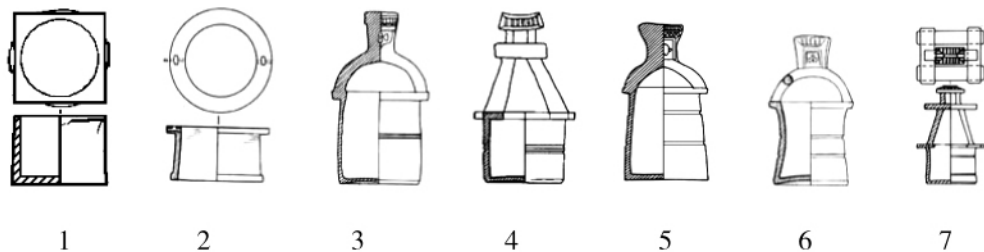
二、南阳汉墓出土陶井模型与周边地区比较

陶井模型是汉墓出土较为常见的随葬明器,

有学者将之归为墓葬中汉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南阳汉墓随葬陶井的风俗与其他地区一样彰显出汉文化的统一性特点。然而受历史、文化、政治、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地区汉代墓葬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器物的类型与组合方面,也表现出自身的区域性特点。因此在汉代考古中根据各地墓葬的不同特点将之分成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区域。这种区域性差异在我们研究器物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南阳地区出土陶井明器在型式与流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点。我们将之与周边地区汉墓出土陶井做

南阳地区汉墓出土陶井型式分期表

型式分期	A				B
	a	b	c	d	
西汉中期	 I	 I	 II	 I	
西汉晚期	 II	 II		 II	
新莽至东汉初				 III	
东汉前期					
东汉后期					



图一 西安地区汉墓出土陶井

1. 咸阳阳陵丛葬坑 K17:8 2. 陕西西户高速公路 M13:7 3. 西安东郊绕城高速 M12:9 4. 西安电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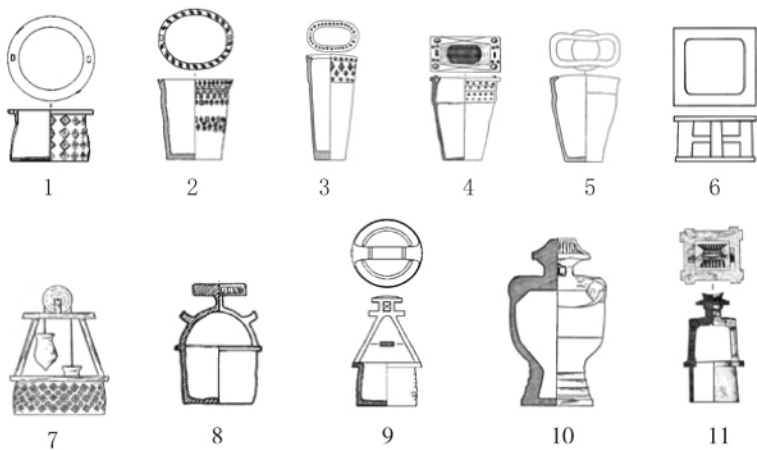
比较,不仅有助于认定南阳陶井自身发展源流和文化属性,而且对认识相关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这里我们根据南阳地区的地理位置坐标,以邻近文化区陕西西安、河南洛阳、湖北襄阳三地汉墓出土的陶井模型为参照比较,初步分析南阳汉墓陶井模型的区域性特点。

1. 西安汉墓出土的陶井模型明器

西安自西汉至新莽时期一直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汉长安作为陪都,其政治地位仅次于洛阳。目前这一地区两汉墓葬的大量发掘与整理,为我们研究关中地区陶井模型明器提供了详实资料。西安地区出土比较集中的汉代墓葬有龙首原汉墓^[38]、白鹿原汉墓^[39]、长安西汉墓^[40]、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41]、西安东汉墓^[42]等。

根据目前考古发掘可知,西安地区汉墓中出现的陶井形制较少(图一),数量也不是很多。西

汉墓葬中随葬陶井者甚少,目前仅见于景帝阳陵从葬坑 K17^[43](图一:1)和西安西户高速公路 M13^[44](图一:2)中,共2件,皆为无陶质井架的陶井模型,井宽平沿,圆筒形。阳陵从葬坑陶井内置有一汲水罐。与南阳陶井相比,这2件陶井井身短,使器型整体更显低矮。阳陵从葬坑陶井时代约为西汉早期景帝时期,坑内又出土陶灶、铜量器、木车马俑、粮食等,可能是模仿仓廩之所。西户高速公路 M13 则为西汉晚期墓葬。而其他西安中小型汉墓中则没有见到随葬陶井模型明器。可见西安虽在西汉早期就已出土陶井模型,在时间上远远早于南阳地区,但仅限于帝陵从葬使用。西安西汉中小型墓葬中除个别墓外,则未见随葬陶井的习俗。东汉时期西安汉墓开始流行带陶质井架的陶井,井身较高,井架多低矮做半环状,少数井架为梯形,井架上多有井亭(图一:3~7)。这种半环状的井架不见于南阳地区。西安地



图二 洛阳地区汉墓出土陶井

1. 洛阳吉利区汉墓 M445:40 2. 洛阳西汉张就墓 IM1835:4 3. 洛阳烧沟汉墓 M99:11
4. 洛阳烧沟汉墓 M1004A:24 5. 陕西西安绕城高速公路 M17:19 6. 洛阳烧沟汉墓 M82:37
7. 洛阳烧沟汉墓 M59A:42 8. 洛阳西郊汉墓 M7037:9 9. 洛宁东汉墓出土 10. 洛阳烧沟
汉墓 M144:16 11. 洛阳烧沟汉墓 M19:7

区一般每墓随葬 1 件陶井,少数多人合葬墓则有 2 至 3 件。

2. 洛阳汉墓出土陶井模型

洛阳西汉时期就为全国著名的商业城市。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地区汉墓出土较多,汉墓的考古分期工作也很早就已完成,尤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将洛阳地区汉墓划分为六期^[45],此后又有学者将此地区汉墓划分为七期^[46]。

与南阳、西安两地出土陶井相比较,洛阳两汉墓葬中随葬陶井模型比较普遍,陶井的形制也多样(图二)。西汉晚期这一地区墓葬中才开始出现随葬陶井,晚于南阳。出土陶井多数未有陶质井架,井沿有对称小孔,上面可能插有竹木质井架。陶井井身较之南阳区增高。部分陶井井身与井栏逐渐分离(图二 2~4)。同期这里出现了带有陶质井架的陶井,井架带有轳轳和汲水瓶,未出现井亭。井身矮胖略外鼓,井身模印有几何纹饰(图二:7)。这是带有陶井架的陶井模型最早出现的地区。东汉中期陶井形制增加,主要流行带有井架、井亭的陶井,井架有梯形、方形和拱形,井身平面有方形和圆形之分。(图二:8~11)此外东汉早期还出现未带陶质井架的陶井,除流行西汉晚期井身较高的陶井、平面方形的陶井栏外,还少量出现流行于南阳的 Ab 型式井(图二:1)。洛阳区陶井井栏多有装饰,常见为模印几何图案。也有的模印神人与兽的浮雕花纹,为其他地区少见(图二:6~7)。东汉晚期出有陶井的墓葬数量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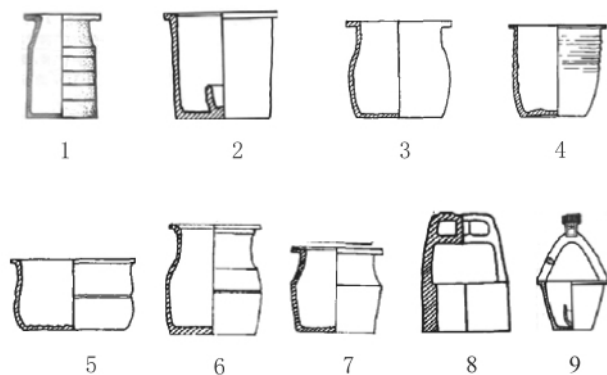
洛阳区汉墓随葬陶井数目为每墓 1 件。如烧沟汉墓陶井出于 86 座墓中共 97 件,每墓多为 1 件,多置于墓室两侧或耳室内。但烧沟汉墓 M 金 1 与 M403 则将井圈埋在墓内铺地砖下,地上只露出井栏^[47]。此外常与陶井伴有陶水斗、滑轮、水槽等附件,出土时多置于井内或井栏上。水槽多呈凸字形,有的做成羊首形^[48]。

3. 湖北襄阳汉墓出土陶井

湖北襄阳两汉时属南郡,与南阳郡毗邻,同属于荆州部所辖。这里两汉墓葬出土比较集中,主要有襄阳余岗汉墓群^[49]、襄阳王坡汉墓群^[50]、襄阳郑家山汉墓^[51]、襄阳高庄汉墓^[52]、襄阳团山汉墓^[53]、襄阳毛纺厂汉墓^[54]等,为研究鄂西北汉墓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襄阳两汉墓葬出土陶井明器非常普遍,陶井形制多样(图三)。西汉早中期出现陶井^[55],为无陶质井架。这里汉墓主要流行无陶质井架的陶井模型,陶井多为褐红陶,井身素面,有些装饰弦纹。井内置有汲水罐(图三:1~7)。偶尔在东汉墓葬中出土有少量带陶井架的陶井模型,井架上有塑有井亭(图三:8~9)。

比照南阳和襄阳出土陶井形制可以看到两者间的同异之处。两地墓葬中陶井出现时间接近,均为西汉中期(郑家山 M39 年代原报告定为文景至武帝后期)。两地均流行未带陶质井架的陶井形制,井腹多为圆筒形,井内多置有汲水罐。但襄阳地区的陶井形制多于南阳地区。两地出现带有陶质井架的陶井均在东汉时期,且数量极少。两地此型陶井所占比例远远低于洛阳、西安



图三 襄阳地区汉墓出土陶井

1. 襄阳岷山 M1:12 2. 襄阳马集 M3:1 3. 襄阳余岗 BM2:6 4. 襄阳余岗 LM11:10 5. 襄阳余岗 LM8:3
6. 襄阳团山卞营 M9:18 7. 襄阳团山卞营 M9:11 8. 襄阳毛纺厂 M3:2 9. 襄阳王坡 M17:4

地区,推测出此型陶井是受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产生,而非本地文化的特有产物。南阳地区陶井质地多为泥质灰陶,也有夹砂红陶,红陶多施红褐釉;襄阳地区陶井质地多为红陶,少见釉陶和灰陶。

通过以上三地汉墓出土陶井明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随葬陶井明器在各地汉墓是非常普遍的,各地区虽然流行陶井的时间早晚与器物形制不同,但陶井模型形制的演变规律均为从无陶质井架向有陶质井架和井亭转变。此外各地汉墓常见为每墓1井配置,少数合葬墓出现2~3井。

河南南阳地区陶井明器与西安、洛阳、襄阳三地相比,在器物形制和流行时期等方面远于西安、洛阳地区,接近于襄阳地区。特别是南阳汉墓无陶质井架的陶井形制在南方长江中游地区汉墓中广泛使用,湖北、湖南两地在西汉早期墓葬中就已出现并使用陶井模型随葬,陶井型式演变序列清晰^[56]。我们可以推测南阳地区的陶井主要是受南方汉墓尤其是两湖地区的影响。

综述,南阳地区汉墓陶井明器的区域特征可以概括为:西汉中期开始出现并使用陶井明器随葬,陶井主要流行无陶质井架形制。东汉时期随葬陶井的墓葬减少,开始出现带有陶质井架、井亭形制的陶井。陶井质地多为灰陶和红褐釉陶,少数质地为夹砂红陶。

三、南阳地区汉墓 出土陶井模型的区域特征分析

俞伟超先生指出:“汉文化涵盖的空间范围,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一种中国的考古学文化,所以其中存在的区域差异性,一定是很大的,对汉文化的研究,不能回避区域差别问题。”^[57]南阳地区汉墓出土陶井模型的区域特征主要与其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南阳西通武关、郾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春秋中期南阳为楚地,楚在此设宛邑。战国后期则为秦所据。两汉时这里为南阳郡所辖,属荆州部。郡治所为宛(今河南南阳市)。西汉时宛已是当时著名的商业中心城市之一。东汉光武帝刘秀因发迹于南阳,遂以

宛城为陪都,又称“南都”。故南阳一直为两汉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南阳地区由于为楚旧地,在西汉早期考古文化面貌上表现出较多楚文化特色。根据考古发掘,南阳地区在墓葬形制、葬俗与随葬品组合变化方面与西安为代表的关中地区、洛阳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差异较大。墓葬形制方面,南阳地区西汉早期均为竖穴土圜墓,无洞室墓。西汉中期以后才出现洞室墓,但洞室墓均为先挖长方形土坑,而后修筑墓室,不同于关中、中原地区的先挖墓道而后掏洞室的做法。洞室墓中双室和三室并列布局不见于关中、中原地区。横前堂多后室墓也与关中、中原地区该类墓差别较大,南阳地区部分横前堂多后室墓前室与后室数量相等,多为2~4间,彼此相通。此外回廊式墓、单穹隆顶、并列双后室双侧室墓也不见于关中、中原地区。建墓材料方面,南阳汉墓以砖石混合结构最多,次为小砖结构和石结构。葬俗方面,南阳地区比较流行合葬,但多为同穴异室合葬,与中原地区同穴同室合葬不同。空心砖墓在该地区似乎并不发达,但实心画像砖却极具地方特色。画像石墓在该地区分布最为密集。随葬品组合方面,西汉早期与关中、中原地区相近,以鼎、盒、壶陶礼器为主。西汉中期以后随葬品组合相差甚远,陶礼器依然存在,而仓、灶、井、猪圈和粮食加工工具磨、臼盘等模型明器比较流行,而在中原地区井、猪圈和粮食加工工具等模型明器则出现在新莽及东汉时期。

襄阳为《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三楚”之“西楚”之地。“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南阳与襄阳地区毗邻。春秋中期南阳至鄂西北为楚地。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秦取楚邓县。秦统一后,划汉水以北属南阳郡,汉水以南属南郡。西汉武帝时两地均属荆州刺史部,东汉因袭之。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使两地考古文化面貌十分相近。如襄阳王坡墓地^[58]西汉武帝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鼎、盒、壶和汲水瓶的组合及形制与河南南阳刘洼汉墓^[59]、东苑小区汉墓^[60]、烟草专卖局汉墓^[61]、南阳市一中汉墓^[62]等地同类器物形制和组合基本相同。湖北襄阳马集汉墓出土的博山炉盖的陶仓亦

常见于南阳汉墓。故南阳与襄阳两地汉代陶井模型的形制与使用时间基本相近,而大量流行于楚旧地的陶井模型明器也为南阳所承继并使用。

东汉时期南阳地区陶井开始出现带有陶质井架及井亭,这种变化几乎是与其他地区同步进行。带有陶质井架的陶井目前最早出现于洛阳地区西汉晚期墓葬中,我们可以将此型陶井看成是中原地区文化因素。东汉承袭西汉统一的政权体制,两百多年的政治、文化的统一使西汉早期的区域性不平衡状况已基本消失,文化趋于统一性。以洛阳为代表的带有陶井架的陶井模型也普遍出现于其他地区,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统一性的反映。当然受地缘政治、社会习俗等的影响,这种统一的汉文化中仍呈现出多样化特色,这也是形成南阳地区汉墓出土陶井模型的区域特征的主要成因。

四、结 语

两汉时期儒家强调以“孝”治国,提倡厚葬久丧。“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导致汉代葬俗的改变。在儒家“举凡生之所用之器,皆为死后从葬之物”的丧葬思想的支配下,墓葬中大量象征财富的陶质明器开始出现,其中私有财产的象征物占很大比例。这时期墓葬中大量出现的仓、灶、井、家禽畜俑等模型明器,是墓主人生前社会生活的客观再现。南阳汉墓出土的陶井模型明器也是受这种丧葬观念影响而产生的。

与关中、中原地区相比,南阳汉墓中随葬陶井模型的流行时间早于两地区。陶井主要流行无陶质井架形制,形制更接近于长江中游两湖地区汉墓出土陶井。根据陶井的出现早晚关系,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南阳地区汉墓陶井明器的出现是受南方地区的影响。东汉时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陶井出现带有陶质井架、井亭的形制,而这一变化与关中、两湖地区等陶井明器变化相一致。

3期。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1期。

[4] 李桂阁《南阳地区汉代陶井及相关问题》,《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5] 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南阳市环卫处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4年第1期。

[6] 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南阳第二胶片厂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7] 刘新、周林《南阳市508厂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

[8]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南阳汉代石刻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

[9] 河南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陈棚村68号汉墓》,《考古》2008年第10期。

[10]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河南省南阳县辛店乡熊营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河南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辛店熊营汉画像石墓》,《考古》2008年第10期。

[11]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一中新校址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4年第2期。

[12] 南阳市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东苑小区古代墓葬清理简报》,《华夏考古》1999年第2期。

[13] 南阳知府衙门博物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嘉丰汽修厂汉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2008年第4期。

[14]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南阳市教师新村10号墓》,《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15]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南阳中建七局机械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16]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河南南阳蒲山二号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17]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拆迁办M3东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0年第6期。

[18]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方城县文化馆《河南方城县城关镇汉画像石墓》,《文物》1984年第3期。

[1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方城平高台遗址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4期。

[20] 《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21] 南阳地区文物队、南阳博物馆《唐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22] 南阳地区文物队、唐河县文化馆《河南唐河县石灰窑村画像石墓》,《文物》1982年第5期。

[1] 黄渭金《当议水井起源》,《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

[23]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唐河县文化馆《唐河县针织厂二号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24]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唐河县文化馆《唐河县湖阳镇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5年第7期。

[25] 河南省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26]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河南省邓州市梁寨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27] 淅川县文管会《淅川县程凹西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

[28] 淅川县文管会《淅川县下寺汉画像砖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29] 刘新、周林《南阳市508厂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

[30] 河南省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31] 南阳市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东苑小区古代墓葬清理简报》,《华夏考古》1999年第2期。

[32]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镇平县程庄墓地汉代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

[33] 河南省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34]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唐河县文化馆《唐河县湖阳镇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5年第7期。

[35] 河南省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36] 南阳地区文物队、南阳博物馆《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3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方城平高台遗址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4期。

[38]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甲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3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白鹿原汉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

[40]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长安汉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4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三秦出版社,2008年。

[42]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4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

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

[44] 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长安汉墓》,737~73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45] 洛阳地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47] 洛阳地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48] 洛阳地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127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49]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市余岗战国至东汉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第3期,襄樊市博物馆《襄樊余岗战国秦汉墓第二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

[5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队、襄阳区文物管理处《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

[5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郑家山战国秦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52] 襄樊市考古队《襄樊高庄墓群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

[53] 王先福、刘江声《襄樊团山卞营墓地第二次发掘》,《江汉考古》2000年第2期。

[54]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市毛纺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7年第12期。

[5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郑家山战国秦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56] 余静《中国南方地区两汉墓葬研究》,211、218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57] 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189页,《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

[5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队、襄阳区文物管理处《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

[59] 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市西郊刘洼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60] 南阳市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东苑小区古代墓葬清理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61] 南阳市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南阳市烟草专卖局春秋、西汉墓葬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62]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一中新校区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4年第2期。

(作者系河南博物院副研究馆员)